

川大史学

(第二辑)

中国近现代史卷

主编 杨天宏 李德英 王东杰
副主编 杨兴梅

Historical Studies at Sichuan University
Collection II: 2006—2016

四川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二十一工程」和「九八五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由原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原华西医科大学三所全国重点大学于一九九四年四月和二〇〇〇年九月两次「强强合并」组建而成。



四川大学出版社

川大史学

(第二辑)

中国近现代史卷

主编 杨天宏 李德英 王东杰
副主编 杨兴梅



Historical Studies at Sichuan University
Collection II: 2006—2016



四川大学出版社

特约编辑:袁 捷
责任编辑:蒋姗姗
责任校对:宋 颖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康 燕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大史学. 中国近现代史卷. 第二辑 / 杨天宏, 李德英, 王东杰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614-9879-8

I. ①川… II. ①杨… ②李… ③王… III. ①史学—文集②中国历史—近代史—文集③中国历史—现代史—文集 IV. ①K0-53②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4459 号

书名 川大史学(第二辑)·中国近现代史卷

主 编 杨天宏 李德英 王东杰
副 主 编 杨兴梅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9879-8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8.75
字 数 50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热烈祝贺

四川大学成立 120 周年

现代史卷

《川大史学》学术委员会

主任：罗志田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挺之 石 硕 刘复生 何一民 陈廷湘
杨天宏 原祖杰 彭裕商 舒大刚 霍 巍

《川大史学》工作委员会

组长：霍 巍

副组长：舒大刚（常务）

成员：

李德英 李映福 李志勇 鲍成志 姜 莉

序^{*}

从 1896 年清政府在四川创办中西学堂算起，四川大学在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发展，至今已过双甲，经历了 120 年的艰难岁月。

历史学科是川大最早建制的学科专业之一，在学科发展史上，大师云集，成果丰硕，影响及于海内外。但学科内不同子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中国古代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古文字学、考古学在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便已为学界瞩目。相对而言，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则起步较晚。教学方面，川大的中国近代史课程大约在 30 年代才开始作为中国通史的一部分而设置。30 年代中期的课表显示，曾就读北师大本科学及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的张景汉教授系最早担任该门课程的任课教师。抗战时期，国府西移，高校内迁，蜀中院校棋布，徐中舒先生以武汉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为蓝本，补充修订，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讲义，是目前见到的川大最早的自编近代史教材。科研方面，徐中舒先生在 20 年代后期参与主持的明清大内档案整理，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及边疆研究所的葛维汉、李安宅、任乃强先生分别从 20 年代后期和 40 年代开始的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学、民族学、

* 本文为作者为四川大学 120 周年校庆所编论文集撰写的序，参考了 10 年前作者为川大 110 周年校庆论文集撰写的序，在此基础上损益而成，文中涉及徐中舒先生的内容经徐亮工教授审定。

宗教学、语言学、人类文化学的调查研究，包含很大一部分时间上属于“近代”的内容。抗战军兴不久，川大成立川军抗战史料搜集整理委员会，由徐中舒、蒙文通先生指导，着手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亦是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不过大致而言，川大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建校后的头 50 余年时间里，尚处于草莱初辟的奠基时期。

1949 年之后，因“厚今薄古”观念的提倡，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新的意识形态指导规范下，“封建的”考据史学以及“资本主义的”实证史学受到批判，历史研究在整体上改变了自近代提倡“新史学”以来的发展方向，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枝独秀的学术局面。川大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发展亦不例外。50 年代初，王介平、李世平两位先生先后到中国人民大学近代史研究生班学习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回校后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川大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学术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王先生早年在清华大学师从金岳霖先生，受过西方哲学与逻辑学训练，在人大学习期间由尚钺先生指导，发表若干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方法上融汇中西，曾引起学界关注。^① 但如同其他学科专业一样，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学术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来自学术之外的限制和干扰，致使诸位学科开创者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教学，后来川大近代史专业人才辈出，多少与这一阶段的人才培育有关。

科研方面，由于时代条件限制，加之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川大近代史同仁主要致力于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决策者是时任历史系主任的徐中舒先生。后来学界利用率极高的巴

^① 在当时，这种关注只能是毁誉多，范文澜就曾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王介平及其阐释的尚钺的学术思想提出尖锐批评。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 214～215 页。

县档案、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四川义和团与近代教案资料及大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均系徐先生推动，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完成。其中巴县档案的抢救整理尤其重要。巴县档案多达10万余件，最初堆放在一个废弃的庙宇中，面临毁损危险。^①1953年，时任西南博物院院长的冯汉骥先生发现这批档案，向徐老提及，受到重视。徐老特向学校申请专款，于1955年将档案运回川大整理。“反右运动”中及稍后一段时期，或许是出于保护人才的良苦用心，川大历史系资料室集中了一批因接受历史问题审查及因划为“右派”而取消教师资格的学者，低心下首，整理档案。1963年谢国桢教授应邀来川大讲学时，曾在资料室看到整理档案的场面并为之感动。^②

保路运动史料最初散存民间，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减租退押”运动时，一些地主需筹措现金退押而出售家产，将原先收藏的书籍或文字资料当作废纸卖到造纸厂。徐先生获悉此事，以其在北平史语所整理明清档案之经历，敏锐感觉其中必有珍贵之书籍及史料，遂向川西文教当局提出保护建议，由川大历史系、四川图书馆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组织人力到造纸厂进行抢救性清理，从中发现大量保路运动史料，遂由川大历史系资料室保管。1956年徐先生将在四川省图书馆工作的戴执礼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专司其事，最终成就了戴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以及在此基础上扩充而成的200万字的戴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台湾版）的问世。^③历史系在徐中舒先生主政时开展的抢救及整理近代文献的工作，为川大后来的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也树立了川大学人重

① 一说藏于即将裁撤改组的西南博物院。

② 谢国桢：《瓜蒂庵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57页。

③ 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之“史料的搜集与编纂”，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史料丛刊》第23号，1994年版，第2214页。

视史料的实证学风。

1976年秋，国家政治发生重大变化，高校的教学科研逐渐走上正轨。到80年代中期，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除老一辈的王、李二先生之外，已汇聚隗瀛涛、赵清、王庭科、匡珊吉、伍仕谦、沈传经、李润苍、郑诚、刘传英等一批学养深厚、在学术界具有影响的先生。隗瀛涛教授出版《四川保路运动史》并参与主编《辛亥革命史》，李世平教授出版《中国现代思想史》，赵清教授出版《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王庭科教授出版《红军长征研究》，李润苍教授出版《论章太炎》，是四川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获得全国性学术影响的开始。这期间，火继薪传，陈廷湘、王笛、谢放、何一民等先后在本校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从事教学科研，“中生代”学者逐渐成为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中坚力量。

学科队伍扩容的同时，研究领域也有所拓展。80年代至90年代初，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最重要的学术发展是隗瀛涛教授及其带领的一批中青年教师在城市史和区域社会史领域的开拓性研究。标志性成果是隗教授主编的《重庆近代城市史》和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隗教授领衔开展城市史研究，独辟蹊径，在理论和方法上有鲜明的自身特色，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结构与功能派”。王笛的论著资料扎实，见解精到，成为川大培养的“中生代”学者在学术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何一民所做城市史研究亦值得称道，从单体城市研究到中国城市整体研究，从不同类型城市研究到城市与社会变迁研究，从城市发展研究到部分城市衰落研究，从内陆城市研究到边疆城镇研究，拓展了近代城市史研究的范围，贡献良多。此外，赵清、郑诚的吴虞与新文化运动研究，沈传经的洋务运动研究，匡珊吉的四川军阀研究，王庭科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研究，刘传英的巴塘教案研究，陈廷湘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谢放的清末新政及四川近代经济史研究，曾瑞炎的华侨与

抗日战争研究，以及稍后徐跃在积蓄多年基础上所作庙产兴学与清末四川学堂研究，多心裁别出，建树独到，为学界关注。

从学术特征上看，这一时期川大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正经由 50 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新传统”向“现代性”和“国际化”转型的重大变化。一些教师在汲取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以形成新的学术范式、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方面作了积极探索。陈廷湘教授所著《中国新文化思想史纲》，思路宏阔，以思想文化的自身逻辑谈思想文化，改变了此前该领域研究中的泛政治化倾向，为后来学者从更新的学术视野认知中国新文化思想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学术借鉴。王笛教授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对长江上游近代经济文化及社会的研究，就新方法的借鉴与运用而言，亦走在国内学者前列。经两代学者的共同努力，1995 年，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部分教授依托专门史专业招收博士研究生；2000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川大近代史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学科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94 年秋，曾经在川大就读历史专业本科（1977 级），后来赴美国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罗志田回到川大工作，受聘教授，成为川大中国近代史及专门史专业的领军人物。罗教授学术底蕴深厚，研究视野宏阔，有着宽广的国际学术背景和广泛的学术交往，主要致力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史研究，陆续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大量后来收录在《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等文集里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并出版堪称思想学术人物研究典范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罗志田教授的到来，使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队伍进一步壮大，学风愈见笃实，眼界更为宽阔，加强了川大人与国内外主流学界的联系，大大提升了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

业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2003年以后，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学术队伍代谢加速。除继续留在川大的教学研究人员外，从川大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的杨天宏教授，以及曾在华东师范大学师从陈旭麓先生、后来留学日本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刘世龙教授相继受聘川大，从事教学科研。“杨天宏教授转涉多地，眼界宽广，注重实证与思辨，践行以中国近现代史为本位的跨学科研究，在晚清政治史、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近代中国自开商埠史、北洋时期中国政制史以及近代中国法律史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刘世龙教授学养丰厚，代表作《清季产业行政与中国的工业化：以商部及农工商部之产业振兴为中心》（日本溪水株式会社2003年日文版），“对于清末产业行政首次作了系统研究”，以其“缜密的思考、广泛的引用、犀利的分析与系统的综合能力”，被日本学界列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参考书，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二人的加盟，在川大中国近代史专业经历重要人事代谢之际，承乏待贤，稳定了川大近代史专业的学术队伍。

与此同时，青年俊秀迅速成长起来。李德英、王东杰堪称最具学术影响且表现出巨大学术潜力的新生代学术领头人。王东杰教授的四川大学国立化研究以及中国近代国语运动研究，实证且富新意，产生了很大学术影响。李德英教授的四川农村土地与租佃关系研究，以及指导进行的大规模口述材料采集，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杨兴梅教授对妇女缠足及近代天足运动的研究，融社会史、文化史、身体史为一体，方法多元，见解新颖，多所贡献。此外，谯珊、范瑛、周鼎、查晓英、郭书愚、邱国盛^①、成功

^① 邱国盛博士聪明勤奋，学业完成留校工作后，短期内即出版《城市化进程中上海外来人口管理的历史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及《中国城市的双行线：二十世纪北京上海发展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版）两本著作并发表不少论文，不幸英年早逝，殊为惋惜。

伟、王果等川大培养或引进的博士，皆天资聪颖，在学期间受过良好学术训练，就职之后作品叠出。他们的聪明智慧以及凭借其智慧所作出的学术抉择，加上不断付出的辛勤劳作，预示了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未来的学术走向和发展。

为汲取更多学术资源，川大中国近代史专业以开放的姿态办学并从事科研，聘请国际著名学者任职川大或到川大讲学。2013年，德国哥廷根大学现代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施耐德受聘川大，以川大教授身份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此外，学院还邀请章开沅、王汎森、黄进兴、史景迁、李中清、李伯重、桑兵、杨奎松、王明珂、沈艾娣、村田雄二郎、李怀印等著名学者，定期或不定期来校讲学并交流资讯，在教学与研究上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开放性 & 多元性。

值此 120 周年校庆到来之际，应同人之请，兹将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教师近 10 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撷取精粹，都为一卷，以作总结。从各位老师历年的教学科研实践及提交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川大近代史专业自创办以来，已形成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和学风。这就是徐中舒先生从王国维、梁启超那里继承并有所发展的“多重证据法”以及蒙文通先生从廖平、刘师培那里继承的“存古开新”精神的执着践行，这一学术传统可归纳为“注重元典、求实务虚、融汇中西、承旧创新”16 个字。其中“注重元典”最为川大近代史专业的一贯学风与学科特色，从上个世纪 20 至 50 年代对档案文献的抢救整理，到今日所作大面积的口述史料采集，以及各位同仁在研究中广博的征引，都体现了这一学风与特色。另外，川大的中国近代史同仁不画地为牢，既问津“主流”学界研究的“中心”地区问题，又不囿于已有研究范围，关注“边缘”地带，重视边疆及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从而彰显了自身的学术个性，在国内乃至国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搜集选编学术论文是一项繁难的工作，在此过程中，编者得到了学院领导和老师的支持与配合，对此深表感谢。我们希望这一工作能够在学校 120 年华诞之际，唤起川大学人的学术记忆，激发追求更新更高学术境界的动力，共同书写川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有传承价值的未来学术史。谨序。

编者

2016 年 4 月

目 录

- 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
——侧重梁启超的观念 罗志田 (1)
- 现代化视野下的社会动员与辛亥革命
——以四川保路运动为例 何一民 (29)
- Speech Activities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The Sichuan
Railway Protection Movement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 Liu Shilong (刘世龙) (56)
- 清末地方学务诉讼及其解决方式
——以清末四川地方捐施诉讼为个案的探讨 ... 徐 跃 (89)
- 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 郭书愚 (116)
- 民初国会存废之争与民国政制走向 杨天宏 (157)
- 因声造字：近代中国字拼音化思想对一个传统训诂
理论的继承式颠覆 王东杰 (208)
- 以王法易风俗：近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干预缠足的持续呼吁
..... 杨兴梅 (260)
- 近代北京、上海城乡关系比较研究 邱国盛 (287)
- 近代传统手工业城市衰落略论
——以景德镇为例 范 瑛 (304)
- 孙中山与川藏铁路建设的构想 譙 珊 (315)
- 试论新式公共交通兴起与近代中国城市发展 鲍成志 (331)

- Taming the Khampas: The Republican Construction of
Eastern Tibet Yudru Tsomu (347)
- 存天下于一方：卢作孚的人生格局与济世道路 … 王 果 (385)
- 李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去民族化”与推动中国科学
发展的矛盾结合 查晓英 (420)
- 危机与暴力：北伐前夕北京群众运动的政治文化研究
(1924—1926) 周 鼎 (441)
- 基督教与华西边疆研究中的本土化进程
——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例 周蜀蓉 (463)
- 佃农、地主与国家：从成都平原租佃纠纷看民国时期
佃农保障政策的实际执行（1946—1948） 李德英 (481)
- 政局动荡与学潮起落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请愿示威运动的特殊样态及成因
..... 陈廷湘 (515)
- 合作运动中的“不合作”
——抗战时期的川省合作指导室与县合作金库之矛盾浅析
..... 成功伟 (571)

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 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

——侧重梁启超的观念

罗志田*

梁启超在 1897 年曾说，“今日之天下”，美、法等国“谓为民政之世”，而中、俄、英、日等国则“谓为一君之世”，以全局言“则仍为多君之世”；盖各国基本皆各私其私，故“五洲万国，直一大酋长之世界”耳。^① 这里所谓“天下”，即由五洲万国组成的“世界”，与今日一般认知略同。然而梁氏在 1899 年又曾说：“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② 民国后梁启超更说：“吾国人称禹域为天下，纯是世界思想。”^③ 这里的“天下”仍是“世界”的同义词，可以置换使用，但所指谓的则仅是“禹域”，或即后来流传甚广的“中国即世界（天下）”说。然细绎其语义，仍有些模棱两可的意味。

其实过去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大致即钱穆所说的“心胸之知”和

*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论著有《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等。

① 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1897 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影印，第 11 页。

② 梁启超：《爱国论》（1899 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 66 页。

③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1912 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第 39 页。

“耳目之知”。^①这一语义在近代的二分给当时的读书人带来无穷的困惑。以前“天下”是一个语境明则语义明的开放概念，即其在特定场合的指谓基本随上下文而定；如今却被分为“中国”和“世界”这两个指谓确定、边界分明的概念。虽然语义脱离语境或许更显清晰，但很多人对此尚不习惯，一些人无意之中可能因为语源的关系将两个语义相差甚远的词当成同义词混用。关键是少有人在学理上将此语义转换的进程厘清，反倒是一些脱口而出的简明表述时常腾诸人口，迄今余波不息。

这类观念的缠结，以及由此而起的一些歧义和误会，多少源于晚清极具影响的梁启超。当时报纸、刊物等兴起不久，梁氏可以说最成功地运用和发挥了这些新传播媒介的力量，在形成近代新思想论域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②如孙宝瑄1902年所说，梁启超“于我国文字之中，辟无穷新世界”；其“闳言伟论，腾播于黄海内外、亚东三国之间”。当时“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③此语或稍夸张，若将范围限于中国读书人，却大体概括出梁氏当年影响的广泛。黄遵宪稍后对梁启超说：“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④

① 钱穆：《晚学盲言·国与天下》（上），《钱宾四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8册，第418页。

② 关于近代新传播媒介和新思想论域，参见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收入其《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136页。

③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一日（1902年9月2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62页。

④ 黄遵宪致梁启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1902年12月10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6页。